

从“零和对抗”到“合作共赢”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 刘永路 徐绿山

摘要: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党的领导集体的海洋安全思想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海洋安全观。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海洋安全观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战略主张和时代特征,总结和概括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和平;合作;和谐;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1)04-0125-08

作者:刘永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徐绿山,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员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就是当代中国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长期实践中,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洞察跌宕起伏的世界风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海洋安全战略思想,从“零和对抗”到“合作共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海洋安全观。研究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为推进中国和平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一、反侵略反霸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张,为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奠基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冷战全面展开后的险恶海上安全环境,对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反对世界海洋霸权、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的紧迫战略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新中国海防战略思想、反对海洋霸权的战略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促进海防建设思想,从而为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确立“近岸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 中国作为濒海大国,海上方向的安全一直与中华民族的强盛息息相关。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主要是源于海防落后。他多次强调指出:“从 1840 年到今天,100 多年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一败再败,屡次吃亏,割地赔款,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没有海防。”^①针对中国近代“有海无防”的状况,毛泽东发出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伟大号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以建设强大的海军为骨干,以加强沿海岛屿守备为依托,以防守海岸线和保卫领海为重点,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来自海上侵略为核心的“近岸防御”海防战略思想。一是确立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1951 年 10 月《中央军委命令》指出:“海防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国防前线。”朱德对海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指出:“海防在整个国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把海防巩固起来,是人民海军的头等任务。”^②二是高度重视海军建设。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海军建设指明了目标:“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确立了海军的地位:“海军应

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③;确立了海军的建设规划:“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④;“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⑤提出海军威慑思想:“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三是构建全方位的海防体系。主要内容是:实行陆、海、空协同作战;建立军、警、民一体的海防体系;构建坚固的海防工程。四是独立自主地建设海上钢铁长城和海上铁路思想。1953年毛泽东在长江舰上指出: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建成“海上长城”。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海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设海军的决议》,明确规定:海军发展以潜艇为重点,相应地发展水面舰艇,并强调采用导弹、原子动力等高新技术成果,把装备现代化置于突出位置。

(二)确立反对海洋霸权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确保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通过美日、美韩、美菲、美台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构筑起太平洋海岛防御圈,对中国海洋安全构成了沉重压力。因此,应对美国的海洋封锁,反对美国的海洋霸权,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一是坚决反对世界海洋霸权。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毛泽东正告美国政府:“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条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⑦。1958年9月针对美国“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的企图,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以国内立法的形式为反对美国霸权提供了依据。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明确提出“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太平洋”的主张^⑧。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再次提出“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的论断^⑨。二是坚持国家主权完整与政治独立原则。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领土上不能有外国军事基地。”1955年5月前,中国政府先后从苏军手中收回旅大和旅顺基地管辖权。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针对台湾问题明确指出:“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坚持这项原则的基础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1963年周恩来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概括为“一纲四目”,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台政策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⑩这一系列构想成为“一国两制”思想的重要基础。三是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反对霸权主义、发展睦邻友好和处理外交和海上争端的基本准则。

(三)提出以经济建设促进海防建设的思想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分析我国沿海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出发,把兴海防与强海防统一起来,制定加快沿海地区工业建设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促进海防建设的方略。一是“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把沿海单纯作为海防前哨而限制沿海经济发展的错误思想,指出:“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了再搬家。”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约有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因此,“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⑪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国际国内形势,把握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方向,提出了以沿海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些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二是发展造船工业加强海军建设。毛泽东强调:“人民海军要大发展,必须发展造船工业,主要靠自己造船,海军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经过几个五年建设计划,我国能建造舰船了,那时我们海军就会逐渐强大起来了”。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指示:“海军可先造小艇,积累经

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作逐步搞起来。”^⑫毛泽东为人民海军建设指明了必须坚持“维护主权”和“自力更生”两大原则,使海军建设立于不败之地。三是成立国家海洋局,谋划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1964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正式提出成立国家海洋局。1964年2月,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在国务院下成立直属的海洋局,由海军代管。”^⑬1964年7月22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4次会议批准,决定成立国家海洋局,直属国务院领导。国家海洋局肩负着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服务的双重使命任务,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专门的海洋工作领导部门,还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张, 标志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初步形成

伴随《联合国海洋公约》生效后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化,国际海权斗争日趋复杂化,海权价值构成日趋多元化,促使海权实现手段综合化与多样化、海洋权益保护与分配法制化、海军力量发展高质量化和高科技化,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海洋斗争的新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权益也日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近海防御”海防战略思想,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内容的处理海洋争端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雏形。

(一)确立“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 关于近海的范围,邓小平认为它既不是近岸水域,也不是遥远的海洋,而是一个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必须的海域范围。邓小平的近海防御包含着四层含义:一是长期防御。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的海军,……是防御性的。海军建设,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⑭,“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是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⑮由此可见,近海防御不是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不论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的这一战略思想始终都不会改变。二是积极防御。邓小平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⑯因此,这一战略思想与中国传统“守土防御”的消极防御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三是区域防御。邓小平根据战略上的需要,把我国的管辖水域以及与之相连的特定水域划定为近海。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⑰,我们的海军“只在太平洋活动,永远不起到远处去的野心。我们是近海作战”^⑱。因此,这一战略思想既不同于重陆轻海、陆主海从的传统的近岸守土思想,更与控制海洋、掌控世界的海军霸权战略毫无共同之处,而是立足于中国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统一的海洋安全战略。四是纵深防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海军各种兵力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依据现代海军和海战发展的这一趋势,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把防御的范围从近岸推到了近海,扩大海军的活动范围,从而增大防御纵深,以保障我国大陆、岛屿及其附近驻泊和活动兵力的安全。近海防御战略所包含的长期防御、积极防御、区域防御、纵深防御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总体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长期防御是时间要素,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是空间要素,积极防御则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主轴要素。

(二)确立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海军的历史使命,在继承毛泽东海军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提出了海军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方略。“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⑲,这是邓小平为新时期海军建设确立的新目标、新任务,也是邓小平新时期海军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曾经指出:“面对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⑳他还说:“我们在海军建设规模上,不仅要保持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质量,使之与保卫我国万里海疆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相适应。在战斗能力上,必须是真正过硬顶用的,要有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先进军事思想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海军人才;要有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要有严格的训练和科学的编成,保证人和武器的紧密结合,以发挥最

大的战斗效能。”^②“顶用”是海军建设的目标。所谓顶用，就是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切实履行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海军的神圣使命。邓小平在谈到海军装备建设时曾指出，质量不好，根本不接收，宁肯少，没有，也不要破烂货^②。“精干”是对海军发展规模的要求。精干的海军必须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装备精良，人员素质高。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参加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全体同志时指出：“那时我们海军的同志天天只有多少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海军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②为实现建立“精干”、“顶用”、“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对人民海军的建设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其思想主要包括：走精干顶用的质量建设之路，恰当处理好数量与质量、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需要与可能、武器装备与人、借鉴与坚持自己特色的辩证关系；发展海军军事理论，搞好海军军事教育，通过海军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海军高技术含量，通过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培养大批海军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坚定搞现代化的思想，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在现有国力下加快海军装备建设，强调海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计划性、梯次性和成龙配套；发挥海军科学技术和物质设施上的优势，参与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走出一条军民兼容、双向发展的新路子；建立数量适当、质量精良的后备力量，形成与海军相结合的海上武装力量体系，使沿海经济开发与海防建设相互依存；加强海军政治建设，有针对性地做好具有海军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人民海军的根本性质。

(三)确立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内容的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 面对台湾问题日趋复杂、海洋划界矛盾与争端加剧、岛屿和海洋资源被侵蚀和掠夺等现实挑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崭新政治思维的海洋安全战略。一是坚持主权，毫不退让。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②在阐述“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一处理海洋权益争端的原则时，邓小平指出共同开发是有原则的，即不能损害国家主权。他多次严正声明：“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②二是搁置争议，稳定局势。在岛屿、海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认识往往相距甚远，大多是严重对峙，互不相让。用邓小平的话说，“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②。因此，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在不放弃主权的前提下，搁置争议，首先是发展国家关系，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争议问题。三是共同开发，共同得利。邓小平关于共同开发原则的提出和战略运用，主要是从解决利益争端、维护和平的战略需要出发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②。譬如，“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②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针对钓鱼岛问题再次重申：“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可否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②

三、新的海洋综合安全观——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张， 标志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正式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海洋安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洞察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广度和经济科技因素上升的深度，对海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安全的重要思想，确立以海洋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提出建立合作安全模式的新主张，提出坚持综合手段与多种措施并举的方略。这一系列思想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局限，以全新的视角，对海洋安全的地位、内涵、模式、途径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它与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安全观既一脉相承，又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和发展，至此，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正式形成。

(一)在对海洋安全地位的认识上，顺应冷战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提出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安全

的重要思想 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海洋安全观确立的现实基础。对此,江泽民揭示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⑩,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中国的安全形势面临挑战。基于这种判断,江泽民强调“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⑪。一是要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海洋。江泽民指出:海洋作为天然屏障,掩护着我国沿海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冷战结束后,海洋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来自海上方向的威胁不容忽视;随着高技术在海战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海洋战场的地位作用将非常突出和重要。二是要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认识海洋。江泽民深刻指出:“海洋蕴藏着远比陆地丰富得多的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随着时间推移,我国陆地资源短缺的情况将变得突出起来,势必制约经济发展。可以肯定,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三是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认识海洋。20世纪70和80年代,邓小平在谈到南沙群岛及钓鱼岛问题时多次指出,这是关系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写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而且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同“维护国家主权”并列起来,置于同等重要的高度。

(二)在对海洋安全内涵的理解上,摒弃冷战思维单维性的安全观,确立以海洋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 依据国际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的特点,江泽民提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单维性的安全观,确立新的海洋综合安全观。他强调当今海洋安全不再单指海洋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还包括海洋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海洋政治安全方面,他主张国家的海洋主权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海洋内政不容干涉;在海洋经济安全方面,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海上经济贸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在海洋科技安全方面,他强调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科技成果要维护人类安全,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在海洋军事安全方面,他指出军事力量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要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在新的海洋综合安全观中,江泽民特别强调,要重视海洋经济安全问题。他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⑫

(三)在对海洋安全模式的选择上,突破“零和”关系的局限,提出建立合作安全模式的新主张 从冷战思维定式与对抗性的“零和”关系出发,则对方的安全就是自己的不安全,别人的强大就是对自己安全的威胁,因而力图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上。这种传统安全观产生的不信任感,导致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存在“安全困境”。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安全新模式——海洋合作安全。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海洋安全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必须开展国际合作。他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⑬在江泽民看来,建立合作安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的经济依存不断加深,安全的“链接性”增大,使得国家利益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零和”结构;而是复杂的“共和”结构;同时,在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大国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安全利益关系,都力求将彼此的矛盾尽可能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要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

(四)在对海洋安全途径的探索上,拓展传统安全观的视域,坚持综合手段与多种措施并举的方略 在海洋威胁日趋复杂,海洋对国家经济影响不断加大的新形势下,过去那种仅仅通过军事实力或采取某一种手段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江泽民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他提出,要实现海洋安全,必须坚持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多种手段和措施综合并举的方略。一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海洋安全问题。江泽民强调,海洋安全归根到底要靠综合国力,必须把经济工作做好。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的“增效器”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国际交往中要以积极的经济贸易来促进国

家间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边对话,最终获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双向解决。二是继承并发展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把外交斗争作为实现国家海洋安全的有效手段。江泽民提出了“以两手对两手”的外交方针,以接触对接触,以斗争对遏制,既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策略灵活,善于斗争。他还在多种场合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澄清了周边一些国家的疑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外部压力。三是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中的坚强后盾作用。江泽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军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他一方面坚持军队建设一定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四是采取多种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海洋争议。江泽民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海洋争议。他指出,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应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江泽民强调,运用海洋法规解决海洋争议,他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法规手段妥善处理各种涉外关系,尤其是解决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江泽民提倡采取“先易后难,分区解决”的步骤解决海洋争议。他认为,我国海洋方向不仅有岛屿、海域和资源争议,还将可能涉及到海洋占有和海洋利用的各个领域,对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分区解决”。

(五)在对海洋安全力量的建设上,深化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海军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加强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心海军建设,阐明了国家富强——海洋权益——海军建设的关系,为跨世纪的海军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江泽民多次强调,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即保卫海洋开发,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打赢为维护海洋权益而进行的海上局部战争;保证海外经济发展。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军队建设“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历史使命”^⑩。他还多次指出,要好好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海战怎样打,锻造思想和技术都过硬的海上精兵。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江泽民多次强调海军要加强综合作战能力建设。在海军成立50周年时,江泽民为海军题词:“为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后来,江泽民又强调:海军“要坚决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海军的全面建设,努力提高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真正具有在第一岛链海域内,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⑪。这些论述与前两代领导人明显不同,这是对海军全面建设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综合作战能力”可以理解为海军航空兵、潜艇、水面舰艇、海军陆战队等各种海军力量,也可以理解为常规和核反击等火力类型。这里海军“近海防御”的内涵是对“近海综合防御”能力的追求,这在2002年12月9日发布的《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了说明。江泽民关于海军建设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海军建设思想:阐明海军不仅要保卫大陆国土,而且要保卫海洋国土;不仅要保卫领海主权,而且要保卫国家海洋权益;不仅要反对外部侵略,而且要坚决履行捍卫祖国统一的神圣职责;不仅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且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服务。

四、“推动建设和谐海洋”——党的新任领导集体的主张, 标志着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新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世界海洋安全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海上方向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更加复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和谐海洋”的重大战略思想,保卫国家海洋利益拓展及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的新海防安全观,“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人民海军”的海军建设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继承和推进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海洋安全的战略思想,把中国特色海洋观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2005年11月9日,胡锦涛

在伦敦金融市政厅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时首次提出,亚非国家要“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⑩。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看法,主张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一)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原则,提出“和谐海洋”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5年以来,胡锦涛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在此基础上,2009年4月23日,在海军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胡锦涛在会见多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全世界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和谐海洋”重大战略思想。他指出:“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对建设和谐海洋具有重要意义。”^⑪胡锦涛“和谐海洋”思想的主题就是“和平、和谐、合作”。“和平、和谐、合作”构成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以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安全和拓展为目标,提出“保卫国家海洋利益拓展”及“远海防卫”的新海防安全观 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以来,在坚定继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积极防御”海防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新的海防安全观。他多次强调,时代的进步和我国的发展,使我们国家安全利益逐渐超出传统领土、领海、领空范围,不断向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扩展和延伸,要加快发展空间和海洋科技,和平利用太空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在2004年底军委扩大会议上,胡主席在向全军郑重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时指出,“必须拓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仅要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关注和维护领土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还要关注和维护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⑫2009年4月23日,胡锦涛指出:“我们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始终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公约》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坚持尊重沿海国的主权和权益,坚持共同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寻求基于和平的多种途径和手段,维护海上安全。”^⑬2010年《国防白皮书》提出:“海军按照近海防御的战略要求,注重提高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⑭胡锦涛新海防安全观始终坚持以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安全和拓展为目标,其核心内容就是“保卫国家海洋利益拓展”和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思想。

(三)以建设和实现海洋强国为目的,提出“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海军建设思想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发出了“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伟大号召。2008年4月9日,胡锦涛视察海军驻三亚部队时,再次号召全体海军官兵要为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努力奋斗。胡锦涛指出:“海军是一个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中,海军的地位重要,使命光荣。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激发官兵为国奉献的热忱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要扎实搞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随时有效遂行任务。要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提高海军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要毫不松懈地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加快推进海军建设,提高海军全面履行使命任务的军事能力。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拓宽战略视野,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学发展,以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海军改革,按照军委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统一部署,结合海军部队实际,认真搞好海军改革的研究论证和总体设计,努力形成有利于海军科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机制。要继续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加强海军正规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依法

治军、从严治军,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始终保持部队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科学管理,遵循战斗力的生成规律抓建设、抓训练、抓保障,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推进海军建设,要坚持人才建设先行。尤其要大力抓好信息化人才、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培养,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①。建设一支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是一个濒海国家发展与强盛的基础,胡锦涛关于海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推动中国和平崛起指明了方向。

五、结语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历史演进过程,记载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各个历史阶段关于海洋安全战略的不懈探索和宝贵经验。虽然不同时期,他们的主张各有侧重,但精神实质却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其主题是“维护我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我国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其主线是“维护主权”、“独立自主”、“和平合作”,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本质特征。它是中国新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海防建设和人民海军发展的基本理论,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注释:

- ①吴殿卿:《毛泽东关心海军建设纪事》,《中国国防报》2003年12月23日。
- ②左立平:《建立强大海军保卫祖国国防》,http://www.chinamil.com.cn/sitel/2006ztpd/2006-11/27/content_658611.htm。
- ③《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版,第11页。
- ④⑤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第67页、第374页。
- ⑦⑧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第162页、第371页。
-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 ⑪⑫高新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海防思想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第127页。
- ⑬杨文鹤等:《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要事》,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 ⑭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281页。
- ⑯⑰⑱⑲⑳邓小平:《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44页、第105页。
- ⑲⑳杨国宇:《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9页、第2—3页、第709页。
- ㉑㉒㉓㉔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第347页、第49页、第87页、第293页。
- ㉖李铁民:《邓小平海军建设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 ㉗江泽民:《加强亚洲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02年5月11日。
- ㉘陈万军:《春风鼓浪好扬帆——江泽毛主席关心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纪事》,《解放军报》1999年5月28日。
- ㉙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182页。
- ㉚㉛《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页、第240页。
- ㉜《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 ㉝杜一平:《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海军建设思想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2001年第4期。
- ㉞胡锦涛:《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4月24日。
- ㉟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解放军报》2005年4月23日。
- ㉟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中国的国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 ㉟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 ㉟徐生、王建民:《胡锦涛检阅南海舰队强调建设强大海军》,新华网2008年4月11日。

(责任编辑 魏延秋)